

渤海史譯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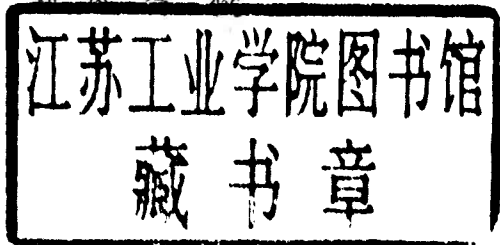
李東源
譯



渤海史译文集

李东源译

刘凤翥校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1986·7

渤海史译文集

李东源 译

刘凤翥 校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出版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铅印室 印刷

350千字 册数：1—2,000

前 言

渤海是我国唐代东北少数民族粟末靺鞨人大祚荣在我国东北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它虽然具有某种独立性，但作为唐朝的羁縻州一直隶属于唐。渤海从公元698年建国至926年亡于契丹，共历时二百二十九年之久，构成了我国东北古代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篇章。

渤海史研究是我国目前东北古代民族史和地方史中令人最感兴趣和研究最活跃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渤海在历史上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周围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往，渤海史也成了我国东北边疆史、政治史和外交史中最敏感的课题，非常引人注目。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渤海史逐渐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学问。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掘了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并发表发掘报告，使渤海史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渤海史的研究在国外仍然盛行不衰，其中尤以朝鲜（包括南、北两方）、日本、苏联三国四方的研究最为深入和广泛，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形成了观点互异的不同学派。

我国在解放后开展了广泛的考古发掘工作和渤海史研究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积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史学界出现了渤海史研究的空前活跃的新局面。有关刊物每年都发表研究渤海史的论文和渤海考古资料，近年又出版了标志渤海史研究新阶段的全面深入研究渤海史的专著，如王承礼同志的《渤海简史》，朱国忱、魏国忠同志合著的《渤海史稿》等等。有的研究单位设置了研究渤海史的专门机构，招收了攻读渤海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可以预言，在近几年内，我国必将出现渤海史研

究的新高朝，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渤海史研究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对国内外前人研究成果的消化、吸收，也有待于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订正甚至批判因历史的局限而出现的前人的失误。

随时了解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信息是提高我们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为了促进我国渤海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翻译介绍国外渤海史研究成果也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出版了《民族史译文集》渤海史专号即该刊第13期，此外，《民族译丛》和《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及其它刊物也不断刊登渤海史译文。

为集中介绍朝鲜南北两方和日本近年研究渤海史的成果，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渤海史研究室的李东源同志在魏国忠、郭素美同志协助下编译了这本《渤海史译文集》，这无疑是对渤海史研究工作的又一新贡献。由于李东源同志较好地掌握了汉、朝、日三种语言文字，对渤海史专业又颇为熟悉，译文比较准确可靠。

《渤海史译文集》既选录了权威学者的论著，又收录了近年活跃在史学界的少壮学者的力作，足以反映朝、日两国三方渤海史界近年的主要观点。尽管这些论文中的许多观点与中国学者的见解不尽相同，但我却认为每一篇都值得我国渤海史研究者认真一读，并且从中受到启示。

这本译文集不仅是我国渤海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对于众多的我国东北古代民族史、东北地方史、东北边疆史和东北考古等专业的教学研究人员来说，也有认真一读的必要。

我为此书的出版而高兴。愿与从事这一专业的同志共勉，为渤海史研究新高潮的到来尽一份力量。

1986年2月17日 刘凤翥

目 录

- 为了渤海史的研究……………朴时亨 (1)
- 渤海的工艺……………朱荣宪 (50)
- 渤海的成立及其文化……………李龙范 (57)
- 南北朝时代与崔致远……………李佑成 (96)
- 渤海王国的社会构成与高句丽遗裔……………李龙范 (109)
- 渤海国志长编影印序……………李佑成 (148)
- 渤海的西部边界……………孙英钟 (151)
- 来投高丽的渤海人考……………李钟明 (168)
- 渤海的居民构成和族源……………卢泰敦 (190)
- 渤海史研究的回顾……………外山军治 (247)
- 东北亚史与渤海国……………三上次男 (257)
- 八连城出土的二佛并座像及其历史意义……………三上次男 (261)
- 渤海国地理考……………和田清 (275)
- 关于渤海首领的基础性研究……………铃木靖民 (328)
- 关于日渤交往中的渤海高句丽继承国意识……………石井正敏 (378)
- 关于张九龄作敕渤海王大武艺书……………石井正敏 (401)

为了渤海史的研究

深入研究朝鲜人民的爱国传统和革命传统，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我们党为确立主体而进行的思想工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金日成同志早就教导我们：“应竭尽全力发掘民族文化遗产，以便继承和发扬这些遗产。”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大会总结报告中，金日成同志再次强调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在于用马列主义深刻解释和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全面研究党的革命传统和民族文化遗产。

我们史学工作者以实际行动拥护党和领袖的教导，前一时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的成绩与党的要求相差甚远，以前我们的史学家几乎没有重视渤海史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就是其实例之一。社稷延续二百数十年的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之一。对它采取这种态度，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一大缺点，它不利于我们全面研究我国民族文化遗产。近两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占据着东北亚的一大角落，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这一文化为古朝鲜、扶余、高句丽、渤海等绵延不断地继承下来。如果我们对渤海具有糊涂的认识，就无法正确地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悠久渊源，从而无从正确地追寻高句丽和渤海王朝灭亡以后的几百年里，高句丽——渤海遗民在其故土上创造伟大文化的踪迹，也就难以正确理解如下史实：高丽王朝以后，我们的祖先从政治上、军事上继续对北方倾注极大的关心，他们同来自这方面的一切敌人展开无情的斗争，正是通过这种复杂艰巨的斗争，我们的民族才得以一步一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当然，我们不能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立即着手这一领域的研究，便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一)

渤海是高句丽人创建的国家，其领土包括高句丽旧领的大部分和广大的新开辟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北半部，除现今的黄海道以外，大都属于渤海疆域。渤海是繁荣昌盛的一大强国，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它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它的血统和文化，是今天我们朝鲜民族血统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渤海史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应当取得它应有的地位，我们对渤海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渤海国被异族尤其是被文化落后的异族（契丹人）所侵占，渤海的文化遗产以及有关自身起源的史料，几乎湮灭殆尽，因此我们在研究它的历史时遇到了极大困难，而在一部分外国史料中还有错误的记载，如把渤海说成靺鞨人或者粟末靺鞨人建立的国家，而不是高句丽人建立的国家，所有这些都妨碍我们给渤海史以足够的注意。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实，必须尽快加以纠正。

另一方面，今后国内外对渤海遗物遗迹的考古发掘，将会补充文献史料的匮乏，而且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目前，在渤海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是渤海国的创始者究竟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的问题，弄清这一问题应成为渤海史研究的起点。渤海是一大强国，既然它在长达二百数十年的时间里占据我国现有领土的几乎一半，那么即使渤海国的创建者是靺鞨人，我们也有必要认真地研究它的历史，何况它是高句丽的直接继承者，它的历史是反对外国侵略，坚决保卫祖国的英勇典范，它的文化传统至今对我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就更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当然在我们的前辈中，也不乏毅然冲破那种普遍的混乱

认识的学者，他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指出渤海是高句丽人创建的国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但终究因史料的奇缺未能透彻地阐明问题的焦点。因此有必要先作一些补充说明。

有些人把渤海国的创业主大祚荣及其父说成粟末靺鞨人，把渤海国看作靺鞨人的国家，这一世俗之说流传甚广。众所周知，这应归咎于《新唐书·渤海传》。此后一些中国史籍盲目抄袭《新唐书·渤海传》，致使一些人误以为真，甚至历代的不少朝鲜史家也将本国的正确史料（这种史料确实有过）置之不顾，相信《新唐书》的谬传，造成了莫大混乱。可是问题首先就在于这一史料的性质。

《新唐书》（宋朝的欧阳修、宋祁合撰）一经问世，便压倒关于唐代的所有史书，大有鹤立鸡群、独占鳌头之势。但至少其中《渤海传》的记事却盲目抄袭了外国（唐）人为某种目的歪曲事实的史料。《新唐书》毕竟是宋人编修的，它不能成为有关渤海的基本史料。因此，我们不能听信《新唐书》关于大祚荣族属的靺鞨说。与其听信以讹传讹的外国（唐、宋）人的话，倒不如听一听我们渤海人自己的话。

727年，渤海第二代武王仁安八年，渤海与日本建交。武王在首次国书中通告渤海的创建，并指出：

“（渤海国）复高丽（即高句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①

既然“复高丽之旧居”的是渤海，那么渤海人就不能不是高句丽人，况且他们还追宗溯祖，提起昔日“扶余之遗俗”，可见他们分明是高句丽人。

其次，758年（渤海第三代文王大兴21年）渤海文王在给日本王的国书中自称“高丽国王大钦茂”^②。当时渤海的正式国号是“振国”，国王在对外文书中或称“渤海郡王”，或称“高丽

国王”。“高丽国王”这一称呼，当时可能是对内对外通用的。自称“高丽国王”者只能是高句丽继承国的国王，而不可能是别人。

在此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渤海王在致日本王的国书中，按照惯例仍自称“高丽国王”，日本王在答书中，自然也称渤海王为“高丽国王”。③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771年（大兴34年）文王致日本王的国书。在这一国书中，渤海国王明确宣布渤海王室是“天孙”即天帝的子孙。④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始祖高朱蒙之父解慕漱，本是天帝之子，其母柳花夫人本是河伯之女。“天孙”一语，无疑由此而来。《广开土王碑》中又有高朱蒙乃“天地之子，母河伯女郎”的记载，《牟头娄墓志》也说“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由此可见，高句丽的王公贵族以为高句丽王室就是天孙，并因此而自豪。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既然渤海国王也能分享这种殊荣，而且同样引以自豪，那么，他不仅是高句丽人，而且也可以看成是直接继承高句丽王室血统的家族出身。对此下文还要谈到。

综上所述，根据残存于日本文献中的渤海王室的自述，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渤海王室确实是高句丽人，他们所立的国家，开始称振国，后来改称渤海，但在本质上，它是高句丽的继承者，也就是高句丽国。渤海人自己述及渤海王室或渤海居民的史料，除见于日本史料者外，别无所见。我们应当首先听信渤海人的自述。

或许有人产生一种疑问：虽然渤海的创业主大祚荣及其后裔，本来不是高句丽人，而是靺鞨人，但是，因为高句丽曾是延续七百多年的一大强国，而且具有高度的文化，而当时的靺鞨还是比较落后的种族，他们历来隶属于高句丽或其它国家和种族，

所以当他们突然建国时，权且冒充了在那块土地上灭亡不久的高句丽。靺鞨人是不是自认为这样作对自己有利，所以才自称高句丽的呢？但提出这种疑问并没有什么根据。

大家知道，7—8世纪前后，靺鞨分为几个部族，是一个具有相当长的历史的部族。其中一部分本来隶属于高句丽，另一部分或者独立，或者隶属于唐朝。就隶属于高句丽的部分而言，他们虽是高句丽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处在附庸地位，一直受种种歧视。他们受高句丽贵族的残酷剥削，战时大都被派往前沿阵地，充当高句丽人的挡箭牌。这样一个种族在高句丽灭亡后不过30年（668年高句丽亡，698年渤海建国），仅凭大祚荣打起反旗振臂一呼，就使高句丽全境的居民一致响应，以疾风迅雷之势建立一大强国，实际上，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不可能的。至于大祚荣本人，中国史书也强调他是骁勇善用兵的人物，是朝鲜历代帝王中一位杰出的英主。假如他真是靺鞨人，并且在短期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如此强大的王国，那么，他们理应堂堂正正地自称靺鞨王国，何必以历来残酷压迫他们的高句丽王室的后裔自居呢？这是不言自明的，渤海王室决不是靺鞨人。

关于大氏的起源也众说纷纭，这与大祚荣的族属问题有关。有人认为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在营州时契丹族授予他大舍利的官职，大祚荣便取其首字为姓^⑤。也有人认为大氏与高句丽王室的高氏一样，都有高大之意，是高句丽语的对音，认为高、大二字实际上是相通的。^⑥

在姓名见于后世史籍的渤海人中，渤海王族的大氏人数居首位：渤海国存续期间为47人（同时期非王族渤海官僚中，其姓氏有案可稽者计117人），渤海亡后其后裔在《宋史》、《辽史》、《金史》、《高丽史》中留有姓名者达48人（同时期包括大氏在内的渤海人后裔计107人）。可见高句丽人在渤海朝廷中占有多

么大的比重，在渤海灭亡以后，他们在辽（契丹）、金、宋等王朝也继续繁衍许久。⑦

即使大氏与高句丽王室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他们至少也是高句丽人。我们还可以知道，除王族大氏以外的渤海达官贵族，大部分也是高句丽人。相传渤海的右姓为高、张、杨、奚、乌、李等六姓。⑧

不消说，六姓中的高氏就是高句丽王室的高氏。而这个高氏，在渤海国非王族官僚存名者117人（参看上文）中，占27人，为数最多；在后裔107人（参看上文）中，占28人，也居首位⑨。可见高氏也和大氏一样，在渤海及其以后时期，都是繁盛的。

高氏以外五大姓的族属，尚无从考查，其中作为渤海官僚或后裔而存名者，每姓只有二、三人至七、八人。上述姓以外的渤海官僚及其后裔留名者，每姓只有一两人，其族属当然也不得而知，所记人名中还有许多令人费解的：究竟是姓、名俱全呢，还是用读音相近的汉字只记其名呢？不详。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仍有确实根据断言：渤海官僚及其后裔的大部分，肯定是高句丽人。以下事实足以为证。

日本史书《类聚国史》载：

“（渤海国）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

（《类聚国史》卷193）

《类聚国史》是892年即渤海国存续期间编撰的，编者菅原道真是日本的高官和学者，他与赴日渤海使节有过多次接触，曾多次互赠诗文。截至当时为止，已有三十余次渤海使节（以贸易为主要目的）聘日，日本使节抵达渤海也近二十次，因此，日本人对渤海内情所知甚详。《类聚国史》比广为人知的新旧唐书

《渤海传》成书更早，因而也是更为直接的史料。

《类聚国史》的记事中，有几条新旧唐书所没有的有关渤海的重要史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上引记事。这是关于渤海居民构成及其阶级身分关系的极其重要的史料。

所谓渤海国无州县馆驿，只有村里，大概是日本使节经过时沿途没有大城市的夸张说法。皆靺鞨部落云者，反映的是靺鞨百姓居多，土人百姓即高句丽人占少数的事实。本来，在日本人看来，渤海是高句丽人的国家，他们所指的土人，当然是高句丽人。可是在渤海，日本人所谓的村长，即府的都督、州的刺史等所有地方官，实际上全都由土人即高句丽人担任。众所周知，渤海兴盛时期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京、府设都督，州设刺史。据载，州下置一至二县，县之长官称丞。既然州、府、县等地方官一律由高句丽人充任，那么中央的几乎全部高官，就更更要由高句丽贵族担当了。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都督、刺史等现职高句丽人地方官以下的享有特殊身分的人，百姓一般尊称为“首领”。关于“首领”，其它史料中还有如下记载：

“开元十五年四月丁未，敕曰：渤海宿卫王子大昌勃价及首领等，久留宿卫，宜放还。”^⑩

这是727年即开元15年（相当于渤海第二代武王9年），唐皇遣返以所谓宿卫身分留在唐国的渤海王子以及“首领”的敕令，这里的所谓“首领”，无疑是任宿卫的王子的随员。

在有关渤海遣日使节一行的记事中，有时也出现“首领”一词。渤海使臣的官秩大致有以下几种：大使、副使、大判官、少判官、大录事、中录事、少录事、译语、品官、首领（首领以下为仆役）。也就是说，“首领”是判官、录事，甚至是译语、品官以下的官秩，在使节一行中属于最下层成员。文献中当然也有“译语以下，首领以上”的记载。^⑪

由官秩名称可知，“译语”以上官员都属于派遣使节时的临时编制，品官和首领却不然，这是平时在国内对于具有一定官僚身分的人的称呼。“品官”、“首领”并不是特定的现任官职，他们相当于后世朝鲜的“两班”。派遣使节时，这些人只作为随员同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头衔。

《类聚国史》的所谓“首领”，就是这种“首领”。在渤海府的、州、县，经常有相当数量的“首领”，而且顾名思义，他们大都是由高句丽人构成的。

尽管没有直接的史料，但根据原高句丽以及后世朝鲜各王朝的情形可以推知，在渤海具有“首领”身分的人，不仅可为内外行政官职所录用，而且在服兵役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原来高句丽的豪民即贵族，在作战部队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一般的下户大都参加后勤供给以及其它辅助性行动。高句丽要求隶属于自己的沃沮、靺鞨以及其它种族也参加这种行动。后者或者负责后勤供给，或者编成独立部队，起协助主力军的作用。渤海无疑继承和发展了高句丽的这种编队方式。在渤海，高句丽人和靺鞨人杂处，而高句丽人居于领导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渤海必然让高句丽人在军事组织中占据特殊的优越地位，靺鞨人则被编入高句丽人所指挥的队伍之中。对普通高句丽人尊称为“首领”，似乎与这种编队方式有关。

后世朝鲜的诸王朝在军队中也实行这种按阶级身分分别编队的方法。高丽的府兵制度和李朝的各种名目的兵役制度等，实际上是让“两班”富人享有兵役上的特权。渤海的这种兵役制，还被直接受高句丽人领导的靺鞨人的子孙即女真人建立的国家——金和清所继承，这就是金的猛安、谋克户制度和清朝旗人的都统、佐领制度。

渤海的“首领”大体上具有上述性质。

可是由于对《类聚国史》的这一记事的句读不同，对于渤海

居民的阶级身分结构的实际内容，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有些人将“其下，百姓皆曰首领”一句读作“其下百姓，皆曰首领。”^⑫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渤海的“百姓”不是通常所说的庶民，而是包括都督、刺史等官僚的特殊身分者的统称，其中都督、刺史以下的“百姓”称做“首领”。这种百姓即首领，当然比一般庶民处于更高的地位。

但这种解释并不妥当。首先，从汉字的字义看，把包括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在内的上层人物称为“百姓”，这是根本不合理的。众所周知，渤海是汉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很难设想，在那里汉字会有这种用例。实际上，渤海的都督、刺史等地方长官，是由中央的大贵族充任的，这有确实的根据。因此，“百姓”一语不可能把这些人包括进去。如若依从这种看法，那么，在称做“百姓”的上层居民中，靺鞨人占多数，高句丽人反倒占了少数。这就不符合只由高句丽人担任都督、刺史等的事实，特别是同高句丽贵族独揽中央大权的基本事实相矛盾。无论从哪一角度看，这种见解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上述种种事实，为渤海国家的居民构成及其阶级——身分关系提供了佐证，换言之，构成渤海国上层的种族——身分，即相当于“两班”的阶层，均为高句丽人。不用说中央官职，连地方官职也都被他们独揽，在兵役方面，他们也居于特殊地位。

与上述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大体估计渤海国中高句丽人与靺鞨人的人数比例。要形成上述种族——身分关系，高句丽人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太少，那么从力量对比上看，就不能形成上述关系，《类聚国史》中也不可能出现那样的记事，不可能简单地写成“靺鞨多，土人少”；与此相反，如果太多，说高句丽人几乎占一半，这也是不可能的。若想把二者的人数比例搞得—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但估计高句丽人大约占十分之三、四。当然人数比例也会因时因地而有所异，但至少日本使节往返

的主要通道，即所谓东京龙原府（日本道）与首都上京龙泉府一带，也就是自古以来的粟末靺鞨住地，大体就是这种情况。由此向西，越往辽河方面即原高句丽要地走去，高句丽人就越多。渤海几乎完全并吞了其东部其他靺鞨部族，或者将他们置于隶属地位，不消说，这一地域几乎全是靺鞨人居住的地区。

至此，本文开头提出的谁是渤海国的创建者这一问题，完全得到解决。渤海国的创建者是原高句丽人。虽然靺鞨人在数量上比高句丽人多一些，而且其首都也位于粟末靺鞨住地，但靺鞨人毕竟是受高句丽人领导的种族。换言之，渤海是原高句丽人的国家。仅就人数关系而言，原高句丽与渤海的区别，在于渤海时期靺鞨人在居民中的比重比高句丽时期大一些而已。原因在于：到渤海时期，原高句丽时期辽河方面的西部疆域和新罗方面的南部疆域有所缩小，而靺鞨族居住的东部疆域却颇有扩展；就其居民而言，在统一三国的战争中不少高句丽人徙居新罗或者向西迁徙，而东面的靺鞨人却增加了许多。

为什么高句丽人与靺鞨人共同成为渤海国居民的呢？渤海的建国史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最初从营州向东进军时，高句丽人乞乞仲象及其子大祚荣的部队就与靺鞨人乞四比羽的部队采取联合行动，他们共同粉碎前来追剿的唐军，共同经历失败与成功，直至渤海国的建立。对此，下文还要提到。

我们解决上述问题，主要依据渤海人的自述和足以为据的基本史料，所使用的资料是必要而且充分的，对此没有再讨论的余地。不过，为使我们的论据更有说服力，下文将补充一些必要的可靠史料，并对一些错误的史料试作批判。

（二）

渤海人自称他们的国家是高句丽的继承者，那么，渤海以外

的其它国家的人，首先是新罗人，把渤海看成什么人的国家呢？

新罗与自己的同族国家高句丽交战，并灭掉高句丽，吞并了它的部分领土（曾企图吞并其全部领土）。高句丽灭亡后，新罗对高句丽遗民反对唐的侵略，谋求国家复兴的斗争给以极大的关心。高句丽亡后三十年，在其故土上成立了渤海。新罗对于领土毗连，共处二百余年的渤海，不可能不关心，也不可能不了解。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圣德王32年及33年条，记载了732年唐提议与新罗合力攻打渤海一事，其中提到渤海时均用“渤海靺鞨”或“靺鞨”的字样。同书《金庾信传》谈及此事时，也称渤海为“渤海靺鞨”。同书地理志的部分记述也用“渤海靺鞨”的说法。然而，这都是金富轼照搬中国史料，机械地承袭其提法的结果，与新罗人本来的看法不相干。^⑬

对于金富轼收录这种不负责任的记事的原因，下文还将详述。

然而《三国史记》其它各条的提法，却与此不同。元圣王6年（790年）条和宪德王4年（812年）条，记载派遣一吉餐伯鱼和级餐崇正出使渤海时，写做“使北国”^⑭。地理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高句丽国内城与平壤相距十七驿，前者在高句丽亡后归入“北朝”，即渤海领内。^⑮

由此可知，新罗通常把渤海叫做“北国”或“北朝”。“北国”或“北朝”是与“南国”或“南朝”相对而言的，而新罗则以“南国”或“南朝”自居。由于渤海文献几乎湮灭殆尽，无法知道渤海究竟把新罗叫做什么，但根据“南京南海府，新罗道也”这一确实源出渤海古文献的记载推测^⑯，渤海可能也把新罗叫做“南国”或“南朝”。这并不是武断的推测。不管怎样，新罗确实有“南北朝”的观念，这就意味着新罗与渤海尽管一时分为南北，互相对立，但这是不正常的状态，二者是行将统一的同族整体的一部分，换言之，是一个统一体内的对立物。这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互成鼎足之势而又各自谋求最终统一的情况完全相同。